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史述和史论：
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黄万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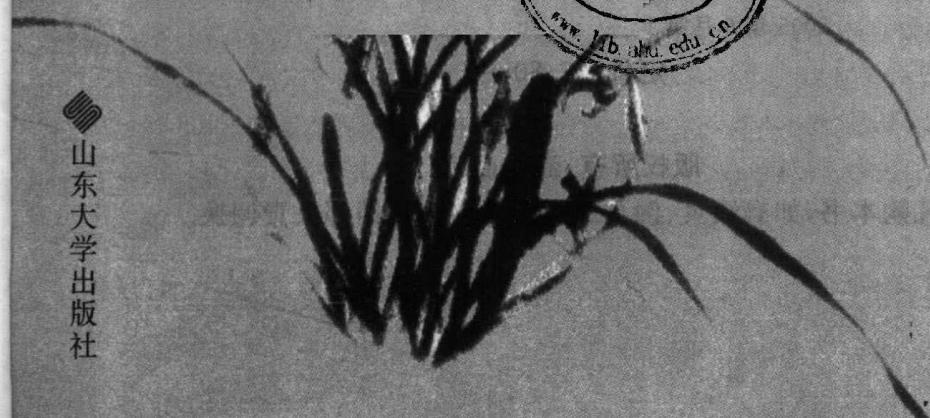
史述和史论：

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黄万华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 / 黄万华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

ISBN 7-5607-2998-3

I. 史…

II. 黄…

III. 抗战文艺研究

IV. I20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122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4.5 印张 634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 8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 言

抗战相持时期，沈从文在谈及中国抗战必胜“乐观是有理由的”时，将日本“把近代中国由于文学革命以后，将文学当作工具，从各方面运用，给国民的教育，保有多少潜力这一件事根本疏忽了”作为最重要的理由来看待。他借一个朋友的话说：“日本人的支那通，只懂中国唐宋时代的文学，民初军阀时代的政治，中国方面较深一点的文学作品所表现这个民族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照例看不懂。较浅一点，如二十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这个民族的热情，表现这个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沈从文明确无误地认为，这就是日本“绝对要失败”的原因，因为他将二战看作人类进步文化跟人类“虚妄”文化的对峙、搏斗，他相信民族文学在国民中保存的深厚潜力和唤起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将支撑起中国的长期抗战。

另一个相反却同样有着历史反省深远意味的例子是日本在台湾殖民文化同化的结果。战后，许多台湾作家重归创作，他们要像阿Q学画圆那样从头学中文，其中包含的辛酸正来自日据时期中华民族文学被泯灭同化的恶果。更深切的痛苦可能来自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倾慕、追随日本的情绪仍主导着一部分台湾人，以致形成了所谓“哈日族”。这是日本殖民同化的“成功”，无需花费一兵

一卒、一枪一弹，就打入并长久占据了人的内心。我们自然要拒斥狭隘、简单的民族情绪，但“哈日族”在台湾的存在的确让人重新警醒于当年二战的实质。

中日文化本来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可当日本痴迷于“大东亚圣梦”而全面入侵中国后，它却充当了摧灭中华文化的刽子手，而中华文化面临日寇的横暴施虐，也确如面临灭顶之灾。郑振铎曾在他的《蛰居散记》中写过一篇《烧书记》，这恐怕是历史上最让人捶心泣血的“文化场景”了：

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

这是兵火之劫，更可怖的是日兵会来挨户搜书，“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提的人不少”，于是，“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烧焦了纸片，飞扬到四邻……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去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

水在落。……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心把它们烧了。……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筐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孩子们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吧，下回去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不厌其烦地抄下上述文字，是想在这些极悲凉的历史场景的重现中，去深入思考二战文化冲突的实质。当这种“烧书”遍及中国南北城乡时，我们也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在这样一种大规模战火中，任何想方设法维系民族文化血脉、传承民族文学薪火的举动都有其特殊的意義了。

二战的实质就是人类进步文化同专制文化间的生死搏斗，而中国作家的参与是前所未有的。这使人想起冯至 1944 年写于昆明的一篇散文《“这中间”》。他在文中先讲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实故事。

1750 年左右，瑞典法隆的一个青年矿工，在和一位少女订婚后忽然失踪，人们到处寻索而无果。50 多年后，1809 年，矿务局改造矿井，工人们在矿坑深处发现了一个青年的尸体，因为被含有防腐性的绿礬水浸透，容貌宛如刚刚死去一般。远近的人们都不知道他是谁，最后，他当年的未婚妻来了，这个一直未婚的老妇人一眼认出了这正是 50 多年前失踪的青年矿工，“一个历尽忧患的白发老处女对着一个神色泰然的 20 多岁的青年的尸体，而这青年是她的未婚夫！”

冯至接着讲到，这故事后来被不少作家写成小说、戏剧，其中

彼得·赫贝尔在他的小说《意外的重逢》中，用他的神来之笔填实了青年失踪到又被发现的“50多年的大空白”：

在这中间，葡萄牙的里斯本城被地震摧毁了，七年战争过去了……耶稣会被解散了，波兰被瓜分了……美国独立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军没有能够占领了直布罗陀……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征服了芬兰，法国革命和长期的战争也开始了……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英国人炮轰了丹麦京城，农夫们播种又收割，磨面的人在磨面，铁匠在打铁，矿工们不断地挖掘……

冯至由这个故事联想到在抗战这样一个“艰苦的时代”，国内仍有“无数的人”想方设法“在自己的周围画出一个神秘的魔圈，让一切痛苦的声音不能侵入”。冯至说：“这些人都使我想起那矿坑里的尸体——不过只有一个分别：那个尸体是偶然的、无意的，而这些人是故意寻求的，自以为得到处乱世的真谛。”

冯至的文章作了这样的束尾：

经过相当的岁月后，这些人像求仙者似地翩翩归来也好，像那矿工的尸体似地被人发现也好，我们经历过的无数苦乐将要对于他们是一块空白。到那时我也要模拟那个短篇记载的作者的笔法把那块空白填起来：“这中间河南经过了大饥馑，敌人打通了平汉线……失掉了长沙，失掉了衡阳，湘桂路上、桂黔路上充斥了流离失所的难民……收复了密支那，收复了腾冲……饿死了、冻死了无数出自农村的老百姓……”

冯至在文中主要是表达他的存在主义人生观：“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然而，冯至的这些文字也传达了中国作家强烈的战时参

与意识,从战地采写到后方创作,无论是在国统区,还是在敌后根据地,甚至在日本占领区、外国殖民区,中国作家的生命记录是没有空白的,中国作家跟自己的民族一起,在战火、迁徙中体验着种种痛苦、希望……

中国作家的合作意识、参与意识从未像战时那样强烈,他们的生活实践也从未像战时那样贴近民众。战时中国文学史的每一页都是充实有力的。

上述战时话语及其现实意义包含了我写这本书的全部意图。
本书分“史述”和“史论”两大部分。

“史述”以 1937 年“七七”至 1945 年“八一五”为限,采用年表加年度评点的结构方式。年表力图呈现同一时段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台港地区、海外华侨社会的文学要事(适当包括跟文学相关的其他大事)及其联系。

所列要事主要侧重战争中各类重要作家的表现、具有战时文学史意义的社团、报刊、作品的问世等,并尽力传达战时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回应,跟世界各国文学,包括日本文学的联系等历史信息,以呈现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学的演变、发展。对以往文学史料一向缺乏的沦陷区、台湾、香港、海外华侨社会战时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评点简要论述该年战事、战争文化环境的变化对不同地区文学运动机制的影响,该年文学创作的大致走向、特征,以及因战争而变成不同政权性质、政治格局的地区的爱国进步文学如何在表现抗日的不同层面(武力抵抗、精神抵抗、文化抵抗)上互相呼应,各地区文学如何在互补态势中深化战时文学自身的探寻,力求既呈现因战争而分隔的各地区文学相异中的丰富性,又揭示战时中国文学的内在整体性。

为了清晰起见,年表中不同地区的事件以不同的符号加以区别,国统区文学不加符号,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学用“☆”标示,上海“孤岛”文学用“○”标示,沦陷区文学用“△”标示,台湾文学用“●”

标示，香港文学用“□”标示，海外地区文学（包括外国人士在中国大陆的活动）用“※”标示。而为了节省篇幅起见，“史述”和“史论”部分的史实尽量不重复，因此，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史论”也包含有史述。

本书的史论分上、中、下三编，有合有分，有面有点。既有跟以往抗战时期文学著述不同，致力于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上海“孤岛”地区、台湾地区等的文学思潮、创作走向等打通作整体审视和把握（这主要是上编的内容），又有分地区地对一些特殊文学形态、思潮的历史呈现，尤其是对以往研究尚属“空白”的战时香港、台湾、南洋华侨社会的文学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主要是下编的内容）。既有对战时中国文学整体面貌的勾勒，又有对战时中国文学的多元形态及其丰富的内涵的具体审视，尤其对战时中国文学的“中国意象”，主题模式及其延伸、衍变，作家的生命体验等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主要是中编的内容）。全部史论都围绕“战争和人类”、“战争和民族”、“战争和人”的中心展开。

黃万华

2005年1月

目 录



一九三七年.....	(3)
一九三八年	(38)
一九三九年	(92)
一九四〇年.....	(132)
一九四一年.....	(173)
一九四二年.....	(215)
一九四三年.....	(257)
一九四四年.....	(292)
一九四五.....	(326)

史 论

上 编

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战时中国文学	(349)
战时中国文学：开放性体系的形成	(363)
战争的毁灭：人性和自我	(373)
以拷问世界的长鞭拷问自我	
——战时中国文学中的知识者形象	(382)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395)
抵抗意识中的“乡土中国”	
——对战时乡土文学的一种考察	(412)
走向民间：古典和通俗	(424)
刚烈雄强：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审美走向	(435)
语言原乡：战时精神故乡的基石	(446)
战争中的世界和中国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化交流	(460)

中 编

战时中国文学的艺术探寻	(481)
战时中国：现代中国形象完整呈现的开端	(493)
重建中的变异	
——战时中国文学中的“家国同构”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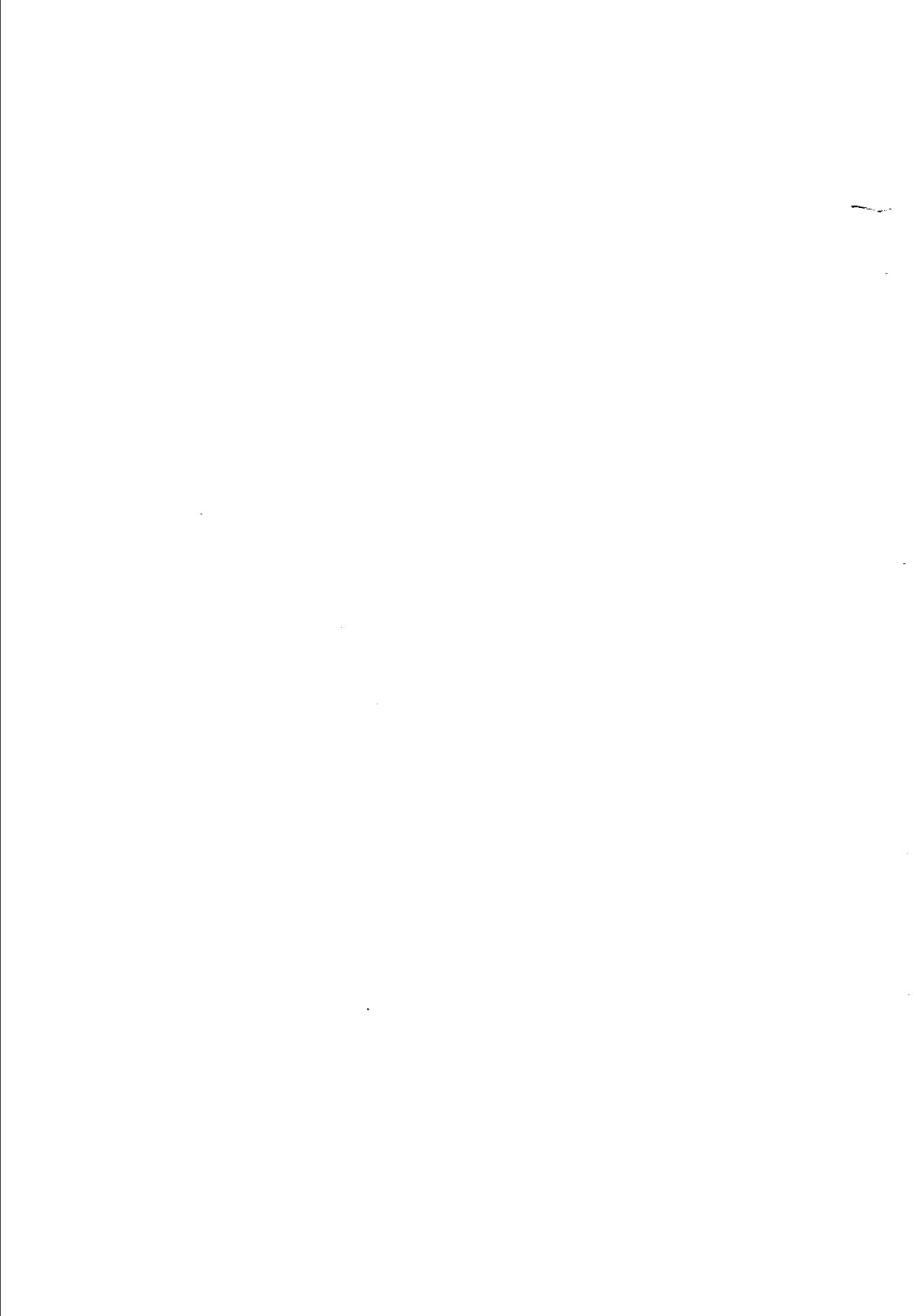
异族、“他者”: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	(517)
战争人生的心灵体验.....	(536)
战时军营文学:中国现代军人形象的启端	(561)
战时中国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	(573)

下 编

延安文学和战时红色经典的构建.....	(583)
政治关怀:敌后抗日根据地文学的主题	(596)
“中原性”和“本土性”纠结中的战时香港文学.....	(612)
血脉沟通中的台湾本土特色	
——战时台湾文学的历史面影.....	(628)
于“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见出历史真相	
——对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的一种评判.....	(640)
战时日占区文学“悖论”中的历史无法消泯性.....	(660)
沦陷的苦难与认同的延续	
——沦陷区文学的民族认同方式.....	(679)
诗领土诗人群和沦陷区现代派诗歌.....	(691)
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浓郁的中国色彩	(715)
参考书目.....	(761)
后 记.....	(768)



史述



一九三七年

二战是中华民族一次深重的苦难，全面抗战是中国人民久已渴望的，战时中国文学就是在这种苦难和希望的并存中开始了自身的历程。

一方面，原先对峙甚至分裂的文坛在抗日的旗帜下聚合、统一；另一方面，全国又分裂成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沦陷区三个大的政治空间，另外还有上海“孤岛”、台湾殖民地、香港殖民地等特殊空间。战时中国文学在这种统一而分裂的环境中呈现出繁杂而多变的面目。

作家的流亡，战火对出版机构的摧毁，使国统区文学进入凋零期，但也开始了新的尝试。《烽火》等刊物代表了文学的战场小型化探寻，而《七月》等的创办意味着现实主义深化的开始。尤其是胡风执笔的《七月》（武汉）创刊号上的《愿和读者一同成长》表明，包括现实主义、思想启蒙在内的五四文学传统并没有因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而中断，它一直延续到战争的结束。

从战争一开始，中国作家就自觉承担起双重使命：文章“入伍”，作家从军，郭沫若领衔，40多名作家的“入阵”宣言（8月）和诗人臧克家等的从军经历，就是这样的例证；但同时，作家又始终未忘却自己的文学使命，艾青在战争流亡中写下了《雪落在中国的土

地上》这样足以传世的名篇(12月)，预示出伟大的抗日战争会产生伟大的作品。八年战争，是中国作家始终自觉履行这双重使命的八年。

战争的第一年，作家流徙频繁。梁实秋立下遗嘱离京南下，老舍、沈从文抛家别妻，离京流徙，丰子恺痛别缘缘堂……都是出于民族气节。而作家大规模的迁徙，从根本上改变了战时中国文学的格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1月)，施蛰存、林同济、吴晗等应聘云南大学(9月)，拉开了重庆、桂林相继成为国统区文学中心的序幕。李初梨在延安《解放》上发表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12月)，颇能反映延安欢迎、接纳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其民主、自由的理想更是吸引着广大作家，就连沈从文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也欲投奔延安，这使得延安以政治体制的主导力量和作家创作追求的一致性而成为战时中国最富活力的文化中心。杜埃《关于建立文化交通站的问题》(12月)指出香港正成为战时文化的一个中心，这不仅是因为香港较宽容的公共空间成为大批内地文人的避乱之地，还在于香港新文化跟海派文化一直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的第一年，战时中国文学多中心的格局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也使中国文学在海外拓展着其生存空间。王礼锡在英国组织“中国人民之友社”(8月)，姚克在欧洲积极宣传中国抗战(9月)，《今日中国》在美国创刊(12月)，刘延陵等赴吉隆坡……都推动着当地的华侨文学成为战时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也使战时中国文学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格局。而包括奥登在内的一批西方著名作家来中国战地写作，更密切了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的联系。

战争的第一年，日军占领了北平、天津、南京及上海大部分地区，日占区的文学形态呈现复杂局面。《台湾新文学》的停刊(7月)，是台湾中文全面被禁的开始，而龙瑛宗这样的新作家的出现，反映出台湾文学抵抗意识的变化。张深切抱着“我们如果救不了

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的明确信念从台湾赴大陆，则多少揭示了台湾文学在战时中国文学中的作用、地位。在东北，乡土文学的倡导(9月)和“写和印”主义(10月)的对峙，呈现出沦陷6年的东北文学的基本走向。北平沦陷后一个多月，《燕京新闻·文艺副镌》借教会学校的特殊环境创刊，并为进步学生掌握，预示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生存将从校园文学开始。而当11月12日上海沦落，租界成为“孤岛”，进步知识界就从《大美晚报》的生存方式受到启发，开始打出洋商招牌，创办抗日报刊，这表明上海“孤岛”文学一开始就采取着特殊的抗日爱国方式。

战事严重，作家无暇从容写作，战争爆发后所出的几部好作品，如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大地的海》、萧军的长篇小说《第三代》、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金剑啸的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等，都是战前积累之作，但大多也已带上了战争的影响。这些作品都是叙事文体。一向写散文的陆蠡在战争爆发的第三个月完成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两篇抗日小说。之后，诗人李金发、杂文家唐弢、新闻记者杨刚等，都投入小说创作中。这预示出，抗战时期将是一个叙事的年代。

战争第一年显示出的又一重要变化是，日本作家越来越紧地绑于侵略战车之上。战争爆发当年，吉川英治抵华进行战地写作，是日本作家参与侵华战争的开始，这一进程的速度还相当快。而日本国内提出的“国民文学论”，则成为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勤皇文学论”。

7月6日 像是一种预言，诗人艾青在沪杭途中写下了《复活的土地》一诗，其结尾的两段是：

就是此刻，
你——悲哀的诗人呀，
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